

往事如烟

梅志



往事如烟

记胡风

梅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

往事如烟

WANG SHI RU YANG

著者：梅志

封面设计：叶雨 马少展

出版发行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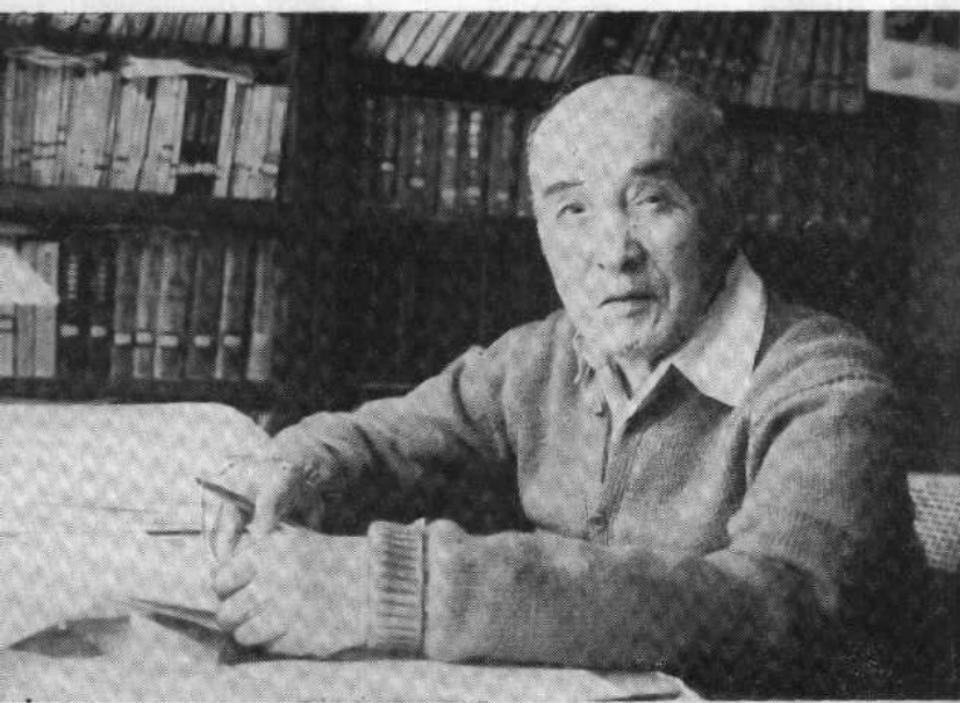
印 刷：北京新华印刷厂

787×960毫米32开本 4.5 印张 66,000字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5,000

书号 10002·114 定价 1.15元



胡 风
(一九八一年)



胡 风

(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，离
北京前二日，于北京东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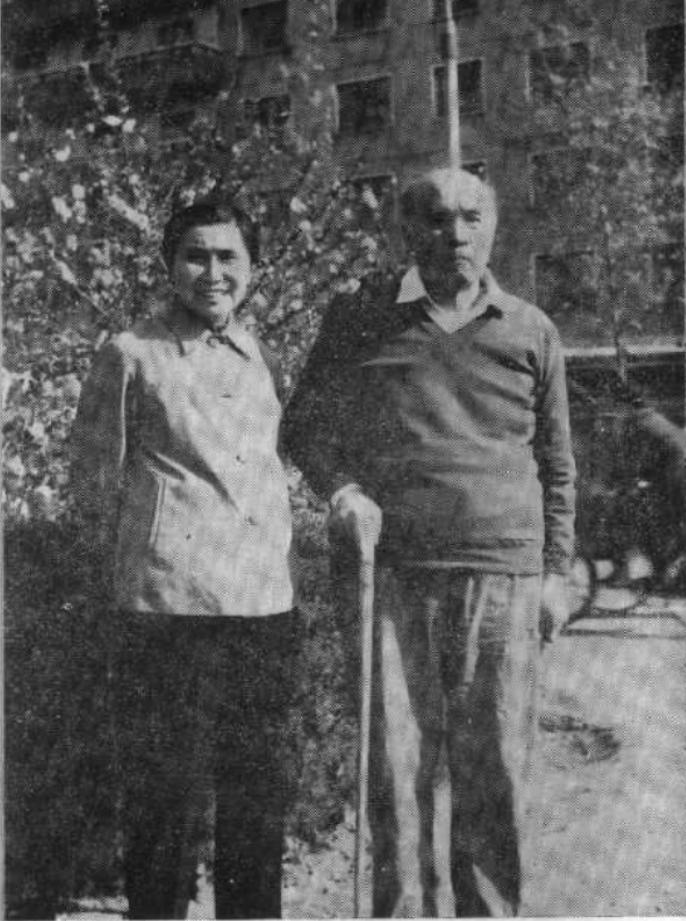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，离北京前二日，于北京寓所前。

上：胡风与梅志
下：胡风与梅志晓山、晓风



一九六六年一月，
胡风与两个儿子
合影

胡风与梅志
(一九八二年五月，
于前三门寓所前)



一九八二年
十一月胡风
八十寿辰，
与梅志、周
颖合影



前　　言

胡风离我而去已快一年了。现在，我一个人来回忆那掺和着泪水的往事，心情是沉重而凄凉的。

但令人欣慰的是，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，胡风的追悼会召开了，悼词中明确推倒了过去的一些不实之词。这可以告慰胡风于九泉。

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，我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这段经历是朋友们和读者们较为关注的，在有生之年将它如实地写出来，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，我当勉力为之。

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，胡风亲眼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又有了“同志”这两个字，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三十年的禁锢后又重新出版，他亲身经历了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、恢复实事求是作风的伟大时代。但回忆那二十多年的难忘岁月，又令人悲从中来，感慨万分，衷心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永不重演！

一、从一封来信引起的

1965年。胡风从家里被拘捕押走，已经整整十年。我恢复自由，也有四年多了。但是，这十年来，我和他一直未见过面、通过信，甚至也不知他的下落。我刚出来时曾向公安部询问他的情况，回答是他很好。提出想送衣物给他，回答是没有必要。想请他们转封信，回答是别影响对他的改造。这样，我就连再请求的勇气都没有了。被熟人或不太熟的人问起时，我只能对他们摇摇头，最多是轻轻的一句，“我也不知他的下落呀！”

1962年时外面有一种传说，我女儿从她工作的农场也听到了，回来告诉我。说不久可能作为文艺界的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，放他出来。这虽

然是个好消息，但我也无从去打探来证实它的可靠性。只有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！

到1965年四五月份时，我忽然收到一封信，是极普通的那种白的、边角有朵花儿的信封，但信封上的字，可不同于一般，是用毛笔书写的、十分端庄老练的字迹，决不是临字帖的小子或学点毛笔字的闺秀所能达到的工夫，看来是出于一位书法老手。并且，还一定是一位老熟人，因为写的是我的本名。下面没有写地址，只有“寄自北京”四个字。这真使我难猜！不知是哪位老朋友，还知道我的地址。

这时，我想起了一个人，便是同我们关系并不密切的沙君。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谈吐风度，又相当地博学，所以很得到一些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欢迎。我们搬家到北京后，他有时来我家，和F（胡风）一道下棋，或聊聊古典文学之类的天，当然有时也发发牢骚。我们出事后，他是否受到株连就不得而知了。

这年春节前夕我到隆福寺去，想为孩子们买点小物件。在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迎面走来一个很面熟的人，他的穿着打扮马上使我认出来了，原来是她，沙君。她仍穿着她那件面料和做工都

很考究的大衣，眼镜、短髯、古典老名士的派头依然如故，只是背显得更驼、胸部也更佝偻些。他手里拿着用布包着的一大包书，似乎是刚从古籍旧书收购店里出来。我转过脸想回避他，可是已被他看见了。他那么高兴地向我走来，我只好点头打了个招呼。他走到我面前低声问：

“你们还好吧！老胡怎样？”

我也低声回答他：

“还好。他的情况那是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他没有匆匆走开，而是陪着我向人少的地方走去，最后我们走到了隆福寺的后街。

我还不知道隆福寺后街的小胡同里竟那样安静，而且扫得挺干净，行人又少，和外面的大街简直成了两个世界。可能是因为住户们都去大街做买卖了吧。

我们就在这背风的胡同里边走边谈。

他告诉我，朋友们都怎样地关心着我们，后来听说我出来了。又苦于打听不到我的住处。他也没忘了告诉我，他因和胡风的交往，被隔离审查了一年多。不过后来总算查明没啥关系，才没被定为“分子”。

说到这里他发出了“嘿嘿”的笑声，但是是一

脸苦相。

我说：“大概是58年吧，我在看守所里偶尔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你在讲古诗词。你那一叹三韵的朗诵，使我感到很亲切，好像回到了人间，并且回忆起了幼小时候读古诗的情景。可惜以后就没再听到了。那时我想你一定没有受到牵连，还很高兴呢！”

“你关了多久？”

“整七十个月。61年，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母亲停尸在医院的太平间，才让我出来为她料理后事。不过倒也没有再把我关回去。”

“现在怎么生活呢？有人管吗？”

“自管自的生活呗。”

“聂绀弩夫妇，还有老田，都挺关心你。只听说你出来了，但你们住的老地方早已拆了盖成大楼，没法找到你们。后来听说住在烧酒胡同附近，老田还去那儿转悠过几次，想在路上遇见你呢！最近又听说你搬到郊区去了，可没人说得清地方。”

“对，我后来搬到朝阳门外了。”我想转移一下话题，就问他：

“你的近况好吧！怎么收音机里一直没再听

到你的播音呢?”

“啊，还播音呢！一言难尽呵！要知道，我现在在双桥农场，是放我假出来料理家务的。”他似乎看出我的吃惊，赶快说：“没什么大事，不是政治问题。说我是庸医伤人和无照行医，其实也不是，唉！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也可能过几个月就能没事儿，让我回家了。在那儿他们仍旧让我给劳改犯人看病，我一个人住一间房，就是没工资了。”他指指手里那大包书，“今天我是来卖书的。好一点的，已卖完了，这些他们就不肯收了！”

我看了下那一大包书，心里感到凄然，但他反倒没有任何难受的表示，很泰然地说，“没什么！反正老母、孩子，他们得给生活费，就是苦了点。我这不就是想法找点钱嘛！”

我很佩服他这坚韧的精神，但觉得在这人迹稀少的小胡同里不可久留，就赶快告诉他我还想到人民市场去看看，就想抽身走开。他却拦住了我：

“且慢，你给我留下个地址吧。”

我如实告诉了他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，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，还很风趣

地指指信封说：

“你看，我就在这个双桥农场！”

我只好接过来将地址写上。但是告诉他，我家还从来没来过我的客人，现在我和小儿子住在一起，女儿在郊区农场当农业工人，平常家里只我一个人，我常常上街买菜，不一定在家。这样我们就匆匆地分手了。

我曾把我的地址告诉过几个认识的人，连我的侄儿在内。但是从没有人来找我，更没有人给我来信，在隆福寺的这一次偶遇，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现在事隔三 four 个月，面对着这封地址写得清清楚楚的信，我不由得想起春节前的那次见面。可能是沙君的来信吧？我赶快拆开信，一看内容和署名一个“芹”字，我就知道，不是他，是另一个朋友。可能从沙君那里得到了我的地址，才写给我的。

信上说：“琪兄，××日下午三时，请你到和平餐厅吃咖啡。”

我去不去呢？我能与之商量的只有我的小儿子。我不能找别人谈这事，也找不到人。但是，孩子对他父亲的一些朋友早已忘记了，又能给我

什么意见呢？一切只有我自己拿主意。不过我还是给他看了信。他的意思是，去看看总不会出什么事的。他又嘱咐我，对人千万不要多说话，要多注意周围的情况。他正在争取入团，所以我这个犯过错误的老百姓还真得多听听他的。

我如约在那天下午三时前就赶到了东安市场的和平餐厅附近。远远地望去，在餐厅门前不远处站着一个瘦高高的男子，果然是老聂。我赶快走向他，大家相视一笑。

“能猜着是我吗？”他问。

“我想也只能是你们。”

“那进去坐坐吧！”

“进这阔气的地方？不吧，还是在外面边走边谈，行吗？我还从没进过这种地方呢！”

“那就进去看看嘛！”

我就只好随着他往里走，但仍胆怯地向四周看了看。他看到我这副样儿，俏皮地说：“有点像我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样儿吧！现在可是怕自己人！”

我们只有苦笑。

我们找了一处车厢式的座位，相对落了座。

他问我：“要点什么？”

“就来杯咖啡吧。”

他也要了一杯咖啡，还要了一盘西点。

坐定后，他才悄悄地和我说：“我约你来，是因为你们有个老朋友，在多方设法打听你们的下落。”

“是谁？”我感到奇怪，还居然有人敢打听我们的情况。

“就是熊子民嘛！他这次来出席三届人大代表会，我看过了他。他一见面就问我，有光人（胡风本名）的消息吗？他一家人怎么样了？我一句也答不出，只有对他摇摇头。他连说，岂有此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总不能连他老婆儿女都关起来吧！他们有什么罪！小潘（指潘汉年）都出来了，还把光人关着？我只好同他说，他老婆放出来了，我们曾见到过她。因此，他就要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，要你去看他。”

“我上哪儿去找他呢？”

“你可以先去信人大代表会议办公室问问。就怕他开完会已走了。不过他对我留下了话，要你积极打听老胡的情况，要求见面。他气得很，说，旧社会我们为革命坐牢，还准许探监送东西呢。”

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过，这等于是在责怪我不去为F的问题奔走出力了！其实他哪知道，公安部对我的请求见面、送东西，都是一口回绝，没有一点可以通融的余地。

我将这些情况详细地告诉了老聂，并且说出了我一直隐藏在心中的猜测，是不是他早已不在人间了。……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

“那不至于，你放心。听说他住过医院，那时我们猜测可能要放出来了，结果还是没放。不过不会出什么事的，他们不会拿他怎么样的。”他很认真严肃地安慰我。“你现在应该达观点，不要往坏处想，再坏也不会比现在更坏了。还是再去向他们要求见面、通信、送东西。”

我为了抑制住刚才的激动，就端起咖啡来，小口小口地喝着。

大约在前年冬季，我和孩子们去天桥剧场看舞剧《小刀会》。走进大厅时见到了老聂夫妇。那时他刚从北大荒劳改后调回北京，还没有“摘帽子”，见到我们有点尴尬，不敢接近，只远远地笑笑，算是打过招呼，就赶快进场了。后来在中间休息时，颖大姐找到我们，谈了谈。我这才知道，这次是他女儿一定要他来看她的演出，他还是第